

Financing life

代表人民与富人斗争的 华尔街“打虎英雄”

◎ 檀江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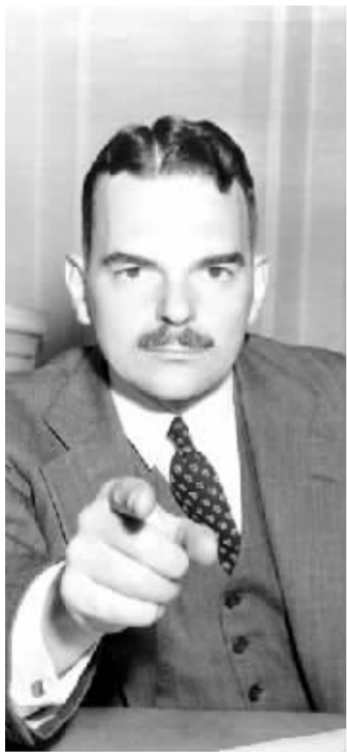
华尔街从来都和天真无缘,却总是与尔虞我诈脱不了干系。正是加上“投资银行家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欺诈造就了一次又一次的股灾。在过去的近百年的时间里,美国证券市场曾经历过多次股灾,其中最严重的有三次:1929年的大萧条、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及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每次股灾必然会使千千万万的投资者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曾经有个笑话,说的是1987年10月末,有人去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住宿。因为当时纽约跳楼的人很多,登记时服务员会问你开房间是派什么用场,如果是跳楼的,就会照顾你开高层的房间,免得你自杀不成落下终身残疾。

说起华尔街的欺诈可谓由来已久,南北战争中的英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将军在1881年卸任总统后,也曾随着淘金的人流来到纽约,联合他的儿子等人在华尔街开了一个证券经纪公司,却不幸被骗。他投资的证券经纪公司落得破产的下场,20万美金的养老金也被骗个精光。最后,他只得将自己的勋章和军刀抵押给当时的华尔街大亨小范德比尔特,用以补偿自己的欠款,余生则靠一些社会人士的捐赠艰难度日。连美国的前总统在华尔街都不免被骗,普通老百姓受骗上当就更不在话下了。毋庸置疑,股灾对普通投资者具有巨大的杀伤力,致使老百姓在垂首顿足之余常常会把亏损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他们认为正是这些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家伙,为了牟取不当利益,使用联手坐庄、公司欺诈以及内幕交易等不法手段抬高股价、制造泡沫,最后才导致股灾的降临。

而每次股灾过后,民怨沸腾之时,纽约州首席检察官都会挺身而出,祭起“蓝天法案”一类的法宝将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华尔街恶棍送进监狱,为民众伸张正义。人们把这些敢于“打老虎”的检察官视为英雄,这些首席检察官也因此声名鹊起,他们甚至会挟着“打老虎”之威望竞选纽约市长、纽约州州长乃至美国总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次股灾使无数投资者受难,让一些违法者落马,也成就了三位纽约州首席检察官“打虎英雄”的美名。

杜威 开创司法介入华尔街的先河

在1929年之前,华尔街并不希望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政府监管。银行贷款条件宽松,投资者们怀着白手起家的梦想,根本不在意未被监控的证券市场中潜藏的巨大危险,纷纷投身于证券交易中。在证监会建立之前,华尔街的问题被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问题都是由行业协会等一些民间组织如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商协会等组织出面解决,华尔街一直都忌讳司法的介入。在战后繁荣经济的诱惑下,1929年股灾之前据说有2000万美国人投身于证券市场,成为大大小小的股东,据估计该时期约有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证券市场,而这些资金在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之后,很大一部分化为乌有。股票市场的崩溃,致使无数投资者损失惨重,大量的银行也因此倒闭,最终导致了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斯·杜威在人们的拥戴下担任纽约州州长,并在1944年和1948年两度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分别与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竞争。《马丁法案》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为该法案与联邦法律有所不同,它不要求检察官证明这种不当行为是出于“故意”或明示被告的犯罪“动机”,而只要求证明其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的投资建议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有因果关系。

1934年美国证监会成立。此后,在一般情况下,证券市场执法行动都是以证监会等联邦机构为主来介入调查和主导指控。虽然美国证监会也会将证券市场中作奸犯科者诉诸法律,但显然其力度不能使老百姓满意。美国证监会之所以在打击欺诈等方面不力是因为:作为联邦机构,其法律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68年的《威廉法案》、1984年的《内幕交易处罚法》、1988年的《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处罚法》以及2002年的《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及保护投资者法案》等联邦法律体系。而联邦法律体系要求对不当行为的指控要求指控者证明这种不当行为是处于“故意”或明示被告的犯罪“动机”。而这种证明对于证监会来说,难度显然是相当大的。

1943年到1955年期间托马



朱利安尼 垃圾债券的终结者

1987年“美国黑色星期一”发生的时候,卢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正担任纽约州首席检察官。民怨沸腾之时,朱利安尼果断出手,将利用内幕消息牟利的伊万·伯斯基和迈克尔·米尔肯绳之以法。米尔肯最终以89项罪名被控,被判入狱10年,并被处以总金额接近10亿美元的罚款。米尔肯的人在美国一定范围内还颇有争议,但美国信贷机构的金融危机跟米尔肯及其发



斯皮策 铁面无私的“犹太包公”



最近一个因为在华尔街“打老虎”而闻名的纽约州首席检察官是犹太裔的民主党人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1999年1月1日,斯皮策就任纽约州首席检察官。从那时起,他就致力于使纽约州成为美国在保护投资人权益、劳工权利及

明的垃圾债券相关也是事实。一些信贷机构还把米尔肯所在的德雷克塞尔银行告上法院,声称米尔肯等人利用欺骗的手法使他们买了大量的垃圾债券,要求索赔。就这样,美国大萧条以后因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从摩根银行分离出来的德雷克塞尔银行也宣布破产。米尔肯人狱以及德雷克塞尔破产之后,华尔街利用垃圾债券进行杠杆收购的活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声名大振的检察官朱利安尼也因此于1994年入选纽约州市长,一直做到2001年“9·11”事件之后。卸任之前朱利安尼发现自己患了前列腺癌。有意思的是,最后帮助他治疗前列腺癌的居然是本应视他为冤家对头的迈克尔·米尔肯。原来,在米尔肯坐了三年牢后,发现自己患有前列腺癌,于是投巨资请专家研究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案并获得成功。

2007年,耐不住寂寞的朱利安尼在蛰伏很久后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在争取党内提名之前,盖洛普民调显示,在民主共和两党主要参选人中,希拉里和朱利安尼是最有希望出线并赢得各自政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实际上,如果不是当初朱利安尼被发现患有前列腺癌,在纽约州参选员的选战中这两位就有机会“雌雄一决”的。现在朱利安尼因为

不能获得党内提名而宣布退选,与希拉里再度失之交臂。

朱利安尼在全国范围内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和高支持率为何却得不到共和党的党内提名呢?其实说来也不奇怪。一方面,朱利安尼出身于意大利裔的民主党的家庭,信仰天主教、支持堕胎等都与共和党的理念相悖。朱利安尼的这种双重性和我国台湾地区一些被称为“蓝皮绿骨”的“墙头派”政治人物很相似;另一方面,朱利安尼在打击华尔街金融犯罪、打击黑手党、“9·11”危机处理方面虽然颇得民心,他自己也以民族英雄自居。然而,在越战战俘迈凯恩这个“战争英雄”面前,也只能自愧不如了。历史上,只要是带领美国人跟外国打仗的“英雄”,在总统竞选中总能取得胜利。远的如华盛顿,甚至打内战的林肯;近的如二战中的联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等。如果在竞选总统之前没有机会参加战争的话,总统任上也会想方设法打上一仗,不管战争是否必要,是否师出有名,民意支持率都会大幅上升。比如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这些美国总统,人人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们上台以后一定会以各种理由打上一仗,然后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维护公共安全方面的“模范州”。美国媒体这样描述他:“这位纽约州首席检察官以打击华尔街和美国共同基金业的不法行为而成名。他的名声是如此之大,只要媒体提到他盯上某个行业,就会引起恐慌,该行业的股票价格就会大跌,首席执行官们谈虎色变,危机管理咨询师们则要取消休假。”2002年,调查人员在美林公司发现了一些电子邮件,表明有些分析家推荐的是他们私下认为是“垃圾”的股票。在众多的证据下,美林公司不得不支付1亿美元才得以庭外和解。随后,包括所罗门美邦、高盛等在内的华尔街十大券商也受到类似调查。同年12月,这十大券商与美国司法及证券管理部门达成协议,同意支付总额超过14亿美元的罚款和其他费用。这在华尔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年后,他又向美国共同基金开刀。美国五大共同基金的高级主管因涉嫌证券欺诈被斯皮策起诉,许多人因此落马。纽约证交所前首席执行官格拉索也在2003年因斯皮策对其调查而下台,并被斯皮策要

■ 财富漫谈

《大腕》的荒诞与《集结号》的恪守

◎ 张曙晖

看了《集结号》,很感动。1948年初,华东腹地,某连47名官兵奉命阻击敌军主力,掩护大部转移。按约定,听到集结号后方能撤退,可始终未听到集结号,全连46名官兵阵亡。唯一幸存者连长谷子地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辗转回到原战场,历经艰辛,寻找46名牺牲者的遗体,最终为46名牺牲者争取到了烈士的荣誉。

故事很简单,让人感动的是谷子地的执着——孤独地在矿山上挖掘,试图找到战友的遗体,千方百计地寻找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证据,就是为了证明46名战友是“牺牲”不是“失踪”。有点像唐·吉珂德孤独地与风车作战,他在人们怀疑、猜测的目光中坚持,幸好老天有眼,人间有情,在好人们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回头看看,谷子地很简单,他就是要还战友们一个真实,在世俗的漠视中他恪守、坚持、寻找,最终在战友墓前吹响集结号的时候,那是一种怎样的快慰呢?

还想起了《大腕》,也是冯小刚导演的,外国大导演突然去世,去世前拜托尤优(葛优)为其主办葬礼,由于缺乏资金,尤优找到了朋友王小帅(英达)一边筹资一边筹办葬礼,结果葬礼成了广告发布会,遗体上满是广告,悲剧成了闹剧,最终大导演死而复生,闹剧无疾而终,王小帅精神分裂住进精神病院。

《大腕》很好看,也很荒诞,而荒诞中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真实,遗体上缀满广告固然不可思议,但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身体的确缀满了广告,道路上、墙上、过街天桥的每一级台阶上,从提供信贷资金、租房、私人侦探到招收男女公关,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让我们无法回避,真正感受到商品经济的空气对现代生活的充斥与弥漫。

《大腕》很荒诞,却是真实里的荒诞,《大腕》又很真实,荒诞里的真实。最让人心口的就是李成儒的那一大段“贯口”,李成儒把这段独白念得如“报菜名”一般琅琅上口,干脆利落:

“股上市前在后边直接加个零卖给下家,给你股权都免谈”,让我们想起纳斯达克创造的奇迹,想起了前不久的阿里巴巴的财富效应:

“这样的房子每平米怎么也得两千美金吧,两千?那是成本!四千美金起!你还别嫌贵,你得弄清买主的心里,能花两千美金的主儿根本就不在乎再多花两千,所以,成功人士的标准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荒诞么?现在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民币一平米的房子不是出来了?十一万人民币拍出来的天价荔枝不是也有过么?

王小帅疯了,尤优却没有,或许前者看到的是商机,是幻想中的钞票;后者则是为了完成死者的遗愿。当死者还阳的时候,对于王小帅来说,就意味着违约,意味着财富梦想的破灭,精神病院里那么荒诞的事儿都能变成现实,可偏偏这个葬礼打了水漂儿,多好的创意呀,完了!

《集结号》和《大腕》,都为我们展示了财富生活的两种路径,两种各自都比较极端的路径:《集结号》强调的是恪守,有些像但斌先生说的,耐心地等待“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持有万科的刘先生,二十年的恪守变成了十几亿的身家。当然,恪守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要忍受孤独,不被人理解,像谷子地,在众人眼里,他的行为不可理喻,就这样在孤独中坚持,不管世俗怎么变,他的恪守不变!

要承受可能的失败,谁能保证自己的恪守真能有一个结果呢?遑论一个好的结果了。如果谷子地的努力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么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呢?

当然,还是要坚持,因为不坚持就什么也得不到,坚持了,或许会与众不同。

《大腕》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像李成儒的那一大段贯口,无论怎样荒诞,但这些荒诞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现实生活是有些荒诞的,但这种荒诞有其独到的作用,就像风险投资本身是荒诞的,目的不过是“后面加个零直接卖给下家”,但募集资金后的创新却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人类探索。

葬礼的广告效应虽然泡了汤,但想想当初超女的广告效应,伊利的那一出“借东风”还是唱得蛮漂亮的。

这个市场上什么荒诞的事儿不会发生?打开K线图常常会惊叹,这个倒楣股曾经那么贵呀?那个好企业曾经这样便宜呀?当初我干什么去了?非理性的市场每天都有荒诞的一幕在上演,只不过有人因此而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人则因为梦想的破灭住进了精神病院。

如果说《集结号》演绎的是真实,《大腕》则展示的是荒诞;《集结号》张扬的是恪守,《大腕》宣泄的是变化;《集结号》是现实中的理想主义,《大腕》则是荒诞中的现实主义。值得佩服的是,《集结号》和《大腕》都出自冯小刚一人之手,真是太有才了!

我们也生活在《集结号》和《大腕》所展示的现实与荒诞之间,或许我们应该对恪守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对荒诞有一些更平和的接纳。还有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能失去心灵的平衡,给自己一份平和,一份从容,一份豁达,细胞分裂或许是好事,但精神分裂绝对是坏事。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